

傅斯年

与
中国文化

『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布占祥 马亮宽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布占祥,马亮宽主编. —天津:天津古籍
出版社,2006.3

ISBN 7 - 80696 - 306 - 5

I . 傅... II . ①布...②马... III . 傅斯年(1896 ~ 1950)—
人物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 K825.4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9853 号

傅斯年与中国文化

——“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布占祥 马亮宽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 - mail: tjgicbs@yahoo.com.cn

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9.25 字数 452 千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 - 80696 - 306 - 5

定 价:58.00 元

“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 讨论会论文集

编委会主任	霍正气	赵振兰	赵润生	
委 员	布占祥	赵立银	马亮宽	徐宗林
	张 辉	杨朝亮	唐明贵	傅乐铜
主 编	布占祥	马亮宽		
编 辑	张 辉	杨朝亮	唐明贵	傅乐铜

序 言(一)

何 兹 全

去年在聊城举行的“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是应该去的。因为身心有点不适，未能去成，甚以为憾。

傅先生是不世出的天才。胡适之先生在为《傅孟真先生集》写的《序》中，不到二百字的一段话里，就用了十四个“最”字来称赞傅先生，说他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等等。

做学问，贵有创始性、突破性的学术见解。别人看不到的历史现象和历史现象彼此之间的联系，你看到了，你把它说明了，这就是你的成就。你看到、说明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越重要，你的成就、贡献就越大。

天不假年，傅先生五十四岁就去世了。他的著述不多，一肚子学问都带走了。但他写的《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文章，都是前无古人的有创始性、突破性的著作。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称赞傅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为“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能够使用创始性和突破性这种超级词汇来描写的”文章。（见台湾出版的《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专刊》序）。张光直教授是考古学家，他称赞《夷夏东西说》为最有创始性、突破性的最好的文章，主要是就考古学的角度说的，其实傅先生写的几篇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文章，都是“最有创始性、突破性的”“最好的”文章。

傅先生对中国学术事业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考古和考古工作，可以说到傅先生才成为科学。小屯殷墟的考古是傅先生和史语所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科学考古。傅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这些方面有贡献的学者，大多是受过他的培养的。

傅先生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

“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 世纪前半世纪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称得起大师级的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钱穆等几个人吧。当然，我的认识有我的接触的局限。将来中国 20 世纪前半世纪史学史上，不会只有这几个人。

还是张光直教授说的好，我们今天来纪念傅先生，不只是为了怀念他，“更重要的是看看今天和明天的学者、学生里面，有没有今天和明天的傅斯年”。我们也要说：“我们希望今天和明天的学者和学生中，能出现今天和明天的傅斯年，超过傅斯年。”

傅先生有知，当会含笑说我说的对，说的好。

2005 年 4 月 14 日

序 言(二)

苗 枫 林

我们高兴地把《“傅斯年与中国文化”论文集》奉献给读者。

20 世纪初叶,是人们观念中的现代中国文化的形成时期。铸就现代中国文化,需要构建两座桥梁:一座是沟通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桥梁,一座是沟通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桥梁。一代学人傅斯年,背负起历史使命,倾尽一生心血投到这两座文化桥梁的构建中。当然,参与这两座文化桥梁构建的诸多文化先驱,他们之间不乏学说、学派之争,甚至非常激烈。不过,历史告诉我们,正是这种论争,使现代中国文化的构架更耐得起时光浸渍。

今天,当我们站在对 20 世纪百年回眸的历史平台上,以中国文化为题去解读傅斯年先生的生平时,我们会为先生在热血青年时代创办《新潮》社,参加新文化运动,鼓吹科学思想,抨击专制积弊的果敢精神而激动不已;会为先生远涉重洋,历时七年,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魄力“游学”英、德,不求一纸文凭,毅然归国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的远见卓识而激动不已;会为先生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培养大批历史、语言、考古等专门人才,主持《明实录》校正和内阁大库及军机处档案整理的磅礴大气而激动不已;更会为先生投身殷墟发掘,城子崖发掘,从而动摇国际学术界几成定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博得中国文化“植根本土”的国际公认的不朽功业而激动不已。崇敬之心,油然而生。

“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 2004 年 8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先生故里山东聊城举行。这次讨论会,是早在 1991 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傅斯年学术研讨会”上,由先生在北京的诸弟子发起。2000 年 1 月,我收到傅斯年先生弟子、九十岁老人杨向奎先生从协和医院病床上发出的

信,要我为这次讨论会的召开和傅斯年陈列馆建设,给予“大力相助”。不久,我到医院看望病中的杨向奎老,本想当面说明我已卸去公职,难有作为。谁知,不等开口,杨向老却强调地告知我,他的信是代表傅先生在北京诸弟子写的,把我本欲出口的话全部堵了回去。不久,杨向老病逝。杨向奎先生是我的老师,既然生前未能禀明,就只有埋头去做。失信于师,为世间不恭。于是,我向山东省政府和聊城市政府求助。好在,我提出的资助款项如数拨付,办会和建馆的诸多事项都得到妥善解决。这时,我才在不胜感激中释去重负。只是到了会议召开,我才吃惊地发现,当年会议的发起者、响应者,诸如季羨林、邓广铭、张政烺、何兹全、杨向奎、王利器、胡厚宣、杨志玖、陈瑒、石璋如、王叔岷诸先生,皆未能出席,傅先生在台湾和旅美诸弟子,仅有“亲传弟子”朱葆琛教授到会。不想,14年转瞬即过,留给我们的竟是“逝者如斯夫”的不胜感慨。

在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聊城大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聊城市文化局通力合作下,傅斯年陈列馆也于研讨会举行同期开馆,使许多珍贵资料得以面世。当然,这里的陈设还是初步的,需待进一步丰富和调整,但毕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我们向给予傅斯年陈列馆支持的单位和朋友表示深深的敬意。

目 录

序言(一).....	何兹全(1)
序言(二).....	苗枫林(3)
众家弟子心中的老师傅斯年先生.....	何兹全(1)
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何兆武 冯佐哲(4)
永远活在学生心中的傅斯年校长.....	朱葆璠(9)
傅斯年先生对国家的贡献	白万祥(11)
浮光掠影忆校长	张存武(17)
怀念校长	徐商祥(20)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兼忆傅斯年、 郑天挺先生	郑克晟(26)
重读傅斯年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王汎森(31)
傅斯年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会	桑 兵(41)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欧阳哲生(50)
试析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现代性及其局限	刘俐娜(64)
略论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	谭世宝(76)
“回到傅斯年”:九十年代中国内地史学的走向.....	张书学 王晓华(84)
中国考古学的“傅斯年特征”	唐际根(94)
1949年后傅斯年与其史料学派对台湾史学教研的影响	李恩涵(100)
“不以空论为学问”——有感于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就是 史料学”	晁中辰(124)
对傅斯年学术识见的思考.....	苏全有(129)
试论傅斯年的儒学观.....	唐明贵(137)
傅斯年与清代学术.....	杨朝亮(145)

傅斯年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析论·····	江心力(153)
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 ·····	耿云志(170)
傅斯年的政治理念·····	张玉法(184)
要正确理解傅斯年·····	王连升(200)
傅斯年炮轰宋子文评析·····	马亮宽(203)
傅斯年与五四文学革命·····	石兴泽(222)
傅斯年的民主政治观·····	王继训(231)
试述傅斯年的抗日民族爱国思想·····	张桂华(237)
傅斯年品格散论·····	孙立群(248)
试论傅斯年的人格魅力·····	郭学信(256)
“兼收并蓄”下的“新旧之争”——1917—1919年北大内部	
国故派与新文化派的对峙·····	刘媛媛(272)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	张荣芳(291)
试析傅斯年的考试观·····	冯 敏(303)
傅斯年与郭沫若·····	王戎笙(311)
傅斯年与吴晗·····	潘光哲(325)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比较·····	翁有为(348)
傅斯年与鲁迅·····	张 辉(364)
傅斯年与夏鼐·····	王世民(377)
Re-forging the Western popular memory of China's Past: Fu Sinian, Hushi and H G Wells ·····	
陈伟强(CHAN Wai-Keung)(383)	
论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学术关系·····	周文玖(398)
傅斯年与齐鲁文化研究·····	安作璋 唐志勇(410)
科学史与道德史学的论争:以傅斯年与南高学者柳诒徵的 讨论为例·····	区志坚(423)
总结发言(根据2004年8月27日上午闭幕会上的录音整理)·····	耿云志(452)

众家弟子心中的老师傅斯年先生

何 兹 全

从我与傅斯年先生的众多弟子的交往和接触中，我能体会得到，大家对傅先生的感情和心态，大约可以用三个字来表达：“敬”、“怕”、“亲”。三者之中，“怕”比较弱。

敬。大家对傅先生的学问没有不是满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

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称赞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他并说《夷夏东西说》和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两篇最好的文章。这是1995年冬我和老伴郭良玉去台北参加“傅斯年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时，在另一个“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学术演讲会”上听张光直教授致开幕辞时讲的。

张光直教授评论说，傅先生的古史文字中，无疑以此文（指《夷夏东西说》）为首，但其他文章也是篇篇掷地有声的。

张先生是考古家，联系到考古，他最重视傅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但对于有文字后的中国古代史说，我更看重《周东封与殷遗民》和《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而后乃东迁》、《姜原》、《论所谓五等爵》等篇。这些文章的好，不在篇篇掷地有声，而在于它们和《夷夏东西说》一样，都是有创始性、突破性的最好的文章。

《论语》和《孟子》里，有以下几段记载：

《论语·阳货》：“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滕）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孔子说三年之丧是天下之通丧；孟子也说三年之丧是夏商周以来自天子至于老百姓都实行的。但滕国的百官们却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我们滕国的先君也莫之行。这是怎么回事？孔子又说，先进于礼乐者野人也，

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这又是怎么回事？野人倒比君子先文明？

这些话，两三千年来都莫得真解，到傅斯年先生手里，才终于得到确切的解释。

周灭商，是小国灭大国。商族的人口超过周的人口。周灭商后，把商人一批批的分给周贵族到各地组成新的国家（实际上是不平等的部落联盟）。他们仍是按部落分居的，周人居住在国，商人居住在野。

傅斯年先生从周人、商人聚族而居的国野之分来看上述这几条记载。孔子所说三年之丧是天下之通丧，是指商人说的；滕国的百官贵族所说的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是就周族说的。孔子所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野人是指居于野的商人；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君子是指的周人；周人是统治族，被称为君子。商比周，当然是先进。

两三千年来都未得到正确解释的古文献，到傅先生手里得到解释。不仅文献得到了确切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解释文献，傅先生真切地解释了历史，阐明了历史。这是有开创性、突破性的解释，这是傅先生天才的表现。

或者有人觉得，这有何难？

这有所难。且听我说个故事。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轰动一时。就有人说，这有何难？哥伦布把一些人请到一块，拿出一个鸡蛋说：谁能让这个鸡蛋站起来？一些人试着使鸡蛋站起来，但没有一个人能使鸡蛋站起来。最后，哥伦布拿鸡蛋往桌子上一压，鸡蛋站在那里了。有些事，事后看着不难，但创始时是难的。

傅斯年先生在史学方面的创见和成就，在学术界是深得人们赞许的。他的弟子们对他更是佩服、尊敬。

怕和亲。说老实话，我们对傅斯年先生是又怕又亲，亲中有怕，怕中有亲。亲是真的，是真情的；怕是假的，是表面的。1931年，我考取北大，我的族兄何思源（仙槎）先生介绍我去看傅先生，请他做我的入学保证人。他极热情地接待我，告诉我要读好古文和外文。但我在北大四年，很少去看他。就是因为怕他。我古文、外语都没学好，怕他考问我。我的师兄弟们怕他又亲他，大约都和我是同样心情。董作宾先生在怀念他的文章《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为纪念创办人终身所长傅斯年先生而作》中曾描述过这方面的情况。他说：“史语所在李庄时……那时新旧同人，除了三两位老友之外，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的青年，受过他的训练和熏陶。爱

之敬之而又畏之。”他有时问我，他们立在大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悄悄溜了，这是为什么？我答：“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其实，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

董作宾先生这些话，正说出了傅先生的众家弟子对他的敬、怕和爱。

行文至此，禁不住思绪飘忽，一时回到李庄，一时又回到现在。当年在李庄的几十口子史语所的同人师友，傅先生去了，董先生去了。现在在世的，台湾只有王叔珉兄，内地只有我和张苑峰（政烺）两人了。

傅斯年先生是我的恩师，我将何以报恩师！

（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何兆武 冯佐哲

今天我们在傅斯年(孟真)先生(1896—1950)的故乡山东聊城,举行“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20世纪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傅斯年先生。

五四运动爆发时,傅先生正值青年时期(时年23岁),尚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表现了非常深厚的学养和卓越的领导、组织才能,显示了“五四”文化革命闯将的本色。当时他主编的《新潮》杂志蔚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可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齐名。该刊物的外文名称作Renaissance(文艺复兴),正好象征五四运动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正式揭开了我国由传统从此大踏步而又不可逆转地进入近代化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序幕,其历史意义恰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傅斯年的名字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五四运动中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五四”以后,傅斯年先生先后去英国、德国留学,受到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以史料翔实、考订精赅为其特色。回国后,傅斯年先生在北大任教,提出了历史学即史料学的口号:这条路线曾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和非难。不过傅先生的本意似乎并非就认为历史学止步于史料,而是主张历史学应该由史料出发,强调历史学是一门以实证为基础的学科,也就是说,没有历史资料就谈不到历史研究。这和他的老师与终生挚友胡适先生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拿证据来”的名言,是一脉相承的。后来,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傅先生的这种提法和口号,曾为我国广大的历史学界所诟病,这是众所周知的,无待赘述。

傅先生一系列的主要名文,如《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等,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声誉和地位。是以中央研究院(即中国科学院前身,第一任院长为蔡元培先生)成立后即由傅先生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一直担任这个职务长达22年之久。把历史学与语言学合在一起,亦足以见傅先生学术路线与德国学派的渊源。史语所原设在

北京(当时称北平),后迁至南京,同时傅先生仍然兼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已故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曾向我谈到:当时南方的史学界大多出自于柳诒徵先生的门墙,与傅先生渊源不深,所以傅先生特别介绍谢先生去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不意谢先生去南京后与柳门的弟子们关系非常融洽,似乎颇有负于傅先生的重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次岁成立了国民参政会。政府迁至重庆后,傅先生以参政员的身份,曾在会上猛烈地抨击孔、宋豪门,博得了“大炮”的声誉,为一时物望所归,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景仰与钦佩;但那时傅先生的职务仍然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史语所所在的四川省南溪县李庄(今属于重庆市),是抗战时期中国文化重镇之一。这里聚集了除傅先生外,还有李济、董作宾、童第周、梁思成、梁思永和林徽因等一大批精英。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靠着信念、责任、尊严、团结和彼此的友谊与同情,坚持科研工作;而北大文科研究所在云南昆明,属于西南联大的一部分;傅先生经常奔波在两地之间。因为躲避日寇飞机轰炸,文科研究所疏散至昆明市郊乡间岗头村,副所长是郑天挺先生。当时有一个流传的笑话是说:每当有人来文研所访问,守门的那位老司閤就一定会问:您是找正所长,还是找副所长?接着就解释说:正所长是傅(副)所长,副所长是郑(正)所长。当时傅先生已不授课,也极少向同学们作演讲。只记得有一次他向同学们作公开讲演,主席是梅贻琦校长,地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前,时间是1940年初,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不久。他那次讲的内容就是汪精卫何以叛国投敌。出乎我们听众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做一番政治形势分析,而是做了一番心理分析——而且是一番弗洛伊德(Freud)式的心理分析。那次讲话的内容大意是:当年汪本人正值翩翩年少,却被富婆陈璧君以金钱、权势和婚姻牢牢控制着,而且从此控制了他的一生,因而造成了他心理上的极大扭曲。这种情结(Complex,傅先生称之为“疙瘩”)使汪终其一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于是就形成了他极为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他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讲演结束时傅先生向我们这些青年学子们说:所以我奉劝你们将来千万不要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要西风压倒东风。这就是他那次讲话的主旨和结论。想来当时大多数同学是不会认同的。像这样叛国投敌、组织伪政府,甘当儿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够单纯用被压抑的原始本能来解释的,而应该是有其更深层次的政

治的、社会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原因。难道心理上的扭曲就一定做汉奸卖国贼，而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然而这次讲话，今天回想起来却有其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傅先生是第一个，至少就我所见，他是我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到史学研究的人。历史归根结底乃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层次的这一环节。一般的历史学家们看问题，往往只停留在社会分析的层次上，而绝少论及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心灵深处，因此往往是未达一间而功亏一篑。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到反叛的时候，往往会提到反叛者最后乃是由于“内不自安”而终于谋反。反叛者是有其野心的一面，但又有其内心被迫而扭曲的一面。这就更深一层地触及到了当事者的内心或心灵深处，而比单纯地论述背景与客观形势更要进一步。弗洛伊德论达·芬奇，要追溯到他的恋母情结，尽管读者未必同意，但仍然不得不敬佩他那穷究及底的探索精神。不知道傅先生这次讲演是不是收入了他的《全集》；但作为一项先驱的首创，这种大胆创新与探索的精神却是值得敬佩的。今后史学界也不宜故步自封，把自己自我封闭在为传统所固定下来的思想框架之中，而应该勇于探索新的路数和途径。要穷究及底一个人在行动时，到底心底里是怎么想的，是受什么情绪和动机所支配的；不然我们就不可能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抗战后期，国内矛盾已日益突出，国民参政会遂组织了一次延安访问团，该团团员是由六位参政员组成。其中有傅斯年和黄炎培二位先生。在延安，毛泽东与访问团团员逐一谈过话；其中他与傅先生在五四时期当属旧识，大概在谈话中也称道了傅先生在五四时期的勇敢和功绩，所以傅先生就自称：我们当时不过是陈胜、吴广而已。同时他大概还请毛泽东写几个字给他，以为留念。毛泽东随即亲笔写了如下的信：

孟真先生：尊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书唐人语以广之。

敬颂

旅安

毛泽东上

七月五日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孟真先生

毛泽东

不久，抗日战争结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去重庆做官，校长由胡适继任。因胡适当时在美国，未能遽返，在胡适回国以前，校长由傅先生代。1945年12月1日，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对内战而举行集会，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打死四人，造成惨案，由此爆发了“一二·一运动”。傅先生遂由重庆来昆明处理学潮。他慰问了学生，接见了学生代表，并说：你们就是我的子女，打死我的子女我不能答应。一时间博得不少同学们的认同。但是傅先生当时的基本立足点却是无法认同学生的民主运动。所以，不久他也和其他几位老师（如，冯友兰先生、雷海宗先生等）一样与大多数同学的主流拉开了距离。

同时，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共商战后的建国方案。出席的各党派与无党派的代表共计38人。傅斯年先生以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身份，成为代表之一。当时的美国教授温德（R. Winter）就指着他的名字说：傅斯年，Another Kuo-min-tang（又一个国民党）。但北京大学复员回到北平（北京）后，傅先生却对伪北大教授毫不假以颜色，一律解聘。傅先生认为：大学教授应该是一个民族的气节的表率，为敌人服务的就不能为人师表。为此当然也免不了有一些纠纷。其后蒋介石来北平，傅先生还陪蒋拜访了文天祥祠。胡适回国任校长后，傅先生回南京史语所，当时面临战局动荡，经济崩溃，傅先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再一次名动一时，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遂即下台。新中国成立前夕，傅先生在台湾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主要的班底仍然是北大的老人，如，毛子水、姚从吾、刘崇铤、钱思亮等各位先生，台大若干年来蔚为台湾的北大。傅先生还曾一再动员老友陈寅恪先生去台湾，不果。不久（1950年12月20日），傅先生即以高血压、心脏病在台湾去世。

综观傅先生的一生，青年时代的辉煌，不失为“五四”一代风云人物的代表。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工作，其间功过得失也是有目共睹的，记得胡适先生曾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系列慷慨激昂的抗日

救亡言行，是值得称道的。他晚年所选择的道路也并不足为异。本来天下大势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即使“五四”以后到“一二·九”和“一二·一运动”，其中的那些精英人物不也是在时代的大潮汹涌澎湃之中，不断地分化、改组吗？有的人继续向前，有的人隐退了，有的人则转化到进步的对立面。人总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俱变的，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原点上。正如诗人歌德在《浮士德》序曲中所说的那样：一切炫人耳目的，都只不过是片过眼烟云，唯有真正的精金美玉才为后世所宝。

（何兆武，冯佐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